

《张议潮变文》中的丝路民族文化交融特质

解文帆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西宁

【摘要】《张议潮变文》是敦煌遗书中的一部以唐代归义军首领张议潮收复、经营河西走廊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创作的讲唱文学作品，更是丝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变文中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安抚各族的行为，体现了丝路各族人民对于统一政权的认可与期盼。本文从变文所反映的丝路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出发，试图揭示出丝绸之路地区“华夷之辨”以及多种民族文化共存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变文文体、语言以及审美的交汇之处，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结构是如何在唐宋之间逐渐形成的问题。

【关键词】张议潮变文；多元文化交融；华夷之辨；审美交融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1日

【出刊日期】2026年7月6日

【DOI】10.12208/j.ssr.20260242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Silk Road ethnic group in *The Transformation Text of Zhang Yichao*

Wenfan Xi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Text of Zhang Yichao*, a genre of storytelling literature discovered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akes the historical deeds of Zhang Yichao, leader of the Guiyi Army in the Tang Dynasty, who recovered and governed the Hexi Corridor as its core subject. It serves as a vivid literary record of ethnic integr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Eulogizing Zhang Yichao's achievements in reclaiming Hexi territory and pacifying local ethnic groups, the text reflects the a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diverse Silk Road ethnic groups toward unified politic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embodied in the work, and examines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Sino-barbarian distinctions and pluralistic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in Silk Road region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grated features in stylistic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of the bianwen, and probes into the dynamic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words】 Bianwen of Zhang Yichao;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 cultures; Aesthetic integration

引言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之地皆为吐蕃所有，导致丝绸之路中断，西域与中原文化隔绝。直到大中二年（848），沙州豪杰张议潮率众起义，成功收复瓜、沙等十一州，遣使奉表归唐，受封归义军节度使，奠定了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地方政治格局^[1]。这是唐朝在丝绸之路上一次重大历史波折，也是中晚唐各民族力量在河西走廊这条重要道路上相互碰撞、博弈及交融的表现。而《张议潮变文》^[2]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品，它是根据当时当地的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创作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与时

效性。它产生和流传在汉、吐蕃、回鹘、粟特等多个民族聚居的河西走廊。这里的汉人保持着中原文化的底色，吐蕃人带来高原游牧文化的烙印，回鹘人继承草原民族的风俗习惯，粟特人以其善于经商的特点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长期混居下，已经形成彼此之间风俗相近、文化交融的局面；另外，这里也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文化的交汇的文化熔炉，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互相影响，造就河西走廊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因此，《张议潮变文》变文必然带有多种文化色彩，在歌颂张议潮英雄事迹的同时，字句间可看到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融合的痕迹。

《张议潮变文》主要抄录于敦煌写本 P.2962、P.3451 及 P.3863 等残卷之上,虽然写本存在不同程度破损,但是从现有材料来看,变文讲述了张议潮建立归义军以后,为保障汉族统治政权,亲自率军征讨周边敌人的事迹。其中详细描述了侦察敌情、布置战场、战斗过程以及取得胜利的过程,并且着重表现了仆射张议潮将军英勇善战的形象。而其中所体现的“夷夏观”以及丝路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特点以及语言风格上的“胡风汉骨”,都反映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1 “华夷”之辨与多民族融合

从文学角度,《张议潮变文》以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一段特定的历史,而且由于其特殊的艺术风格而蕴含了大量多民族文化的内容,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进入文本内部,去考察它怎样通过叙述的方式来构建一个旨在为归义军政权正名的“华夷”秩序,的同时却又在人物刻画和战争描绘上不经意间流露出敦煌地区不那么清晰和固定的民族边界,同时展现出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各种族的吸引力以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矛盾的复杂性,因此变文对河西地方性的再建构,也就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夷夏观”的河西地方性再建构。

1.1 “大唐忠臣”的叙事建构与正统性

《张议潮变文》中丝路民族交融特点是由多种原因。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要隘,历来有“各族杂居”的特点。汉代移民戍边使汉族定居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部族融入,唐代丝绸之路兴盛又引来粟特、回鹘、吐蕃等族商人、僧侣居住,出现“胡汉杂居”的局面。敦煌是河西走廊门户及丝绸之路重要城市,在敦煌遗书中可以看出,唐代大量粟特商人在这开设店铺进行交易,回鹘使者经常来往,这都为变文融入交融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安史之乱导致河西防务空虚,吐蕃从 764 年占领凉州后统治河西近百年。虽然有强制剃发易服的吐蕃化措施,但是“蕃汉节儿”共同管理的方式使汉藏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交往。842 年,吐蕃瓦解之后,张议潮起义招揽汉、吐蕃等各族民众,在唐朝官员沈亚之的《沈下贤集》中有记载:“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这说明当时河西各民族人民在吐蕃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张议潮及其归义军抗争异族的原因。

敦煌数百年形成的“文化熔炉”也为变文提供了丰富素材。宗教上佛教繁盛,祆教、景教并存,敦煌遗书中大量汉文、藏文文献说明多种宗教共处;语言上除了汉语还有吐蕃语、回鹘语文献存在;文体也包含少数民族的内容。归义军为了维持其统治而实行“抚柔”的政策^①(见《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莫高窟第 156 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及变文中都反映了这支军队的多民族性。由此可见,变文为兼顾各族受众融入多元文化元素,凸显了民族交融特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议潮变文》利用多种手法塑造张议潮“大唐忠臣”的形象。首先是通过天命叙事来确立合法性,这是整个叙述的主旋律也是其建立华夷关系的前提条件。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并非团结一致,而是内乱频发他们对中原的文化既向往又抗拒,他们一方面觊觎中原富饶的资源,一方面渴望先进的文明。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传统“夷夏观”的颠覆,变文中对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刻画也并非纯粹的对抗,而是汉民族吸纳、联结了反抗残暴统治的民众,共同对抗侵略百姓的不义之举。

虽然文章主要描写的是战斗情景,但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却是谁拥有中原地区。无论是“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还是“汉主神资通造化,殄却残凶总不留”^②,这种对于中原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于唐王朝统治的坚定维护,都足以见得张议潮及其归义军对于其政权赋予了不容置疑的正统性。变文一开始就把事件放在一个非常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背景之下,即对“大唐”的一片赤诚。在文中“即乃点兵,鏖凶门而出”的出兵仪式也十分符合古代的军事礼仪,显示出了“受命于天”的正统地位。当变文中记载回鹘劫掠唐朝使者,当变文记载回鹘劫掠唐使时,张议潮“心生大怒”的反应实践了《诗经·大雅·板》“大邦维屏”^③的诸侯职责,这种反应是一种自觉维护朝廷的尊严的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也体现了张议潮身为大唐臣子的本分。而这种叙述强调的是张议潮所发动的一切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割据一方,而是为了清除边境的祸患,使天下重新回到“王化”状态。这一系列层层递进的叙事,将张议潮从一个地方军事领袖,升华为帝国道统在河西地区的化身。他不仅是瓜沙的守护神,更是唐王权与华夏文明在河西区域的旗帜。这种叙事建构,为归义军政权赢得了当时所需的生存空间与

^① 英藏敦煌文书 S.6342 号《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十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16 页。

^③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630 页。

政治资本,也使其功业在历史书写中获得了正当性。

“华夷之辨”,也称“夷夏之辨”,华夷之辨属于政治文化理论范畴。其核心要义是崇尚文明,以文化标准来判别某一政权文明还是野蛮。此评判与政权的族别、地域无关,且只针对政权而非个人。它是中国古代用于区分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民族的一整套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3]。变文在刻画对手时,称吐蕃、吐浑等为“蕃贼”“蕃戎”“奸虞”,把他们的行为形容为“侵袭沙洲”“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①,从而在道德层面将张议潮的军事行动定义为“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这种叙事方法借用中原传统的夷夏观念,给归义军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披上了一层“尊王攘夷”的外衣。

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张议潮的成功并非仅靠沙州汉人,他成功地联合了河西地区的豪强义士和僧侣以及其他民族的势力^[4]。吐蕃的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也公开表示“吐蕃无主,则归大唐”,这也表明张议潮与部分吐蕃政权结成了同盟。虽然变文对此并未明写,但这一历史背景深刻影响了文本的叙事逻辑。张议潮所率领的归义军是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单纯“华夷”观念的军事政治同盟。变文并没有一味地强化“华夷之辨”这个概念,而是在坚守现实和政治原则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使其能够适应并解释河西走廊复杂的民族现实。它展现的是一种实践中的华夷观,一种生存与发展的巧妙平衡。

1.2 “中原英雄”“异族将士”和“唐王朝”的形象塑造

基于自身的优越感,汉系民族对待从事游牧、渔猎等生产活动的周边民族的态度中不自觉地带有“未开化”“粗陋”的歧视成分(比如,将“狄”“蠕蠕”等以“犬”“虫”为偏旁的汉字用作他们的族称)。当儒家华夷之辨理论分别以原本为族别、地域名称的“华(夏)”“夷”作为“文明”“野蛮”的指代符号时,由此导致的民族歧视的误会也就难怪了。然而,如果叙事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华”与“夷”的对立上,那么它的文学价值是单薄的。变文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在确立基本秩序的同时,对“中原英雄”与“异族将士”的塑造突破了僵化的刻板印象,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在变

文中,华夷之辨也来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它不仅仅带有对抗的色彩,甚至出现了相互审视,相互肯定的意味。

首先,从张议潮的形象来看,他既是心向大唐的臣子,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英雄上将谋如雨,蠢愚蕃戎计岂深”^②,在他身上既有中原儒将的足智多谋,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勇武刚强。张议潮身上这种敦煌汉人精英的品质正是在与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对抗、交往过程中磨炼而成。这种英雄人物的塑造正好符合了晚唐时期敦煌人民对于理想,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而又近乎完美的领袖式人物引领他们摆脱外族统治,回到中原王朝怀抱,并且丝绸之路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而变文中王端章出塞这一事件,则说明唐朝希望通过册封回纥来稳定西北地区的局面,伊州刺史王和清密切监控回鹘动向的描写体现了边地军政一体化的特点,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也可窥得多元化的政治外交人物形象。

第二个方面,变文对反面人物,如吐蕃军队的描写,也并非一味地妖魔化。“炖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③,而张议潮的军队在征战中虽以汉军为主,同时也吸纳了诸多少数民族军民,作战场景中各族人民的交锋与接触,反映了河西地区多民族混居的现实。在多年的战争中,少数民族勇士的牺牲也是必然的,这些军事描写也表现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为后续的族群交流奠定了基础。变文在强调吐蕃军队和回鹘军队贪婪、叛逆的同时,也通过激烈的战争场面渲染,客观上承认了对手的强大与骁勇。例如,“两军相见如龙斗,纳职城西赤血流。”^④的描写,将战争看作两个强大军事阵营之间的公平较量,而非正义战胜邪恶的理想化叙事。这种书写方式,反映了边地居民对异族对手的了解与尊重,是客观史实的文学反映。

而彼时的唐王朝对张议潮及其归义军的态度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统治阶级对其既封赏利用,又充满猜忌并加以防范。名义上通过“入朝”、授予旌节褒奖张议潮及归义军,但在实质上默许周边势力崛起,限制和削弱其力量,防止其成长为另一个难以控制的河北藩镇^⑤。这种来自上层阶级的防范和猜疑也为归义军后期因孤立和内部争斗而最终衰亡埋下了伏笔。唐王朝和

^①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页。

^②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页。

^③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页。

^④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页。

^⑤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64页。

张氏归义军之间这种复杂的情感态度,与变文中“忠心向唐”的张议潮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变文中强化了“英雄”这一形象塑造,也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当时敦煌一带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张议潮及归义军的情感态度,这种政治矛盾和人物个体塑造之间的碰撞也是敦煌变文的特色之一。

总之,《张议潮变文》所体现的民族交融具有文学、历史以及现实意义。在文学方面,它融合了中原豪杰气概与河西各族人民好战精神,弥补了河西地区唐代通俗文学的空白也印证了唐代通俗文学的包容性;在历史上,它呈现了中晚唐时期河西地区民族交流融合情况,史书记录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变文作为一种即时性文体,对多民族将士、吐谷浑文化等的记载,可与敦煌文书、莫高窟壁画相互印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现实中,相互融合,多元共存的理念为当代丝路文化传承提供了内涵支撑,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历史经验,也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

2 文体、语言与审美趣味的交融

敦煌地区的文化风格深刻影响了《张议潮变文》的体裁、语言与审美趣味。变文兼具“胡风汉骨”,是中原与西域文化融合的见证,文体上散韵相间、说唱结合的形制融合中原叙事与敦煌讲唱艺术;语言以汉语为基底,吸收西域语言特质,呈“汉胡杂糅”风格;审美上,中原忠义伦理与西域英雄崇拜相融。

2.1 变文体式与边疆讲唱场景

变文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通俗讲唱文学作品,它是佛教讲唱活动的产物。唐代时佛教的讲经活动有僧讲、有俗讲,且这类讲经活动是较为频繁的^[5]。变文样式就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在敦煌这个地方又获得新生,而具有“胡风汉骨”的文体特性,是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鲜明写照,也暗含着晚唐时期包容开放的夷夏观念。敦煌变文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佛教内容为主,另一类是以历史故事为主,都大量使用骈体句子,骈体句是韵文中主要部分,与白话散文形成对比关系,相互补充。变文中通俗散文接近民间口语,质朴浅白、灵活通俗,主要交代人物情节、推动故事发展;而工整的骈体韵文音节和谐、辞藻华丽,便于谱曲歌唱,多用于铺陈场景,渲染氛围,极大增强了文章艺术性和抒情性。这样的散文叙事和骈韵抒情相结合的形式完全打破了以前书面文学传播的障碍,即使是不懂文化的中原底层百姓或者语言风俗迥异的西北少数民族受众,也能够通过表演者的歌声、表情以及伴奏音乐节奏

理解变文内容,感受其中情绪,这让变文成为敦煌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共享的文学。

敦煌变相与变文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变相、变文作为佛教的化俗手段,它们都可以称为“变”;第二,讲唱敦煌变文时,通常都配合使用了变相画;第三,随着敦煌变文的盛行,石窟中也出现直接根据变文创作的变相^[6]。“变相”是佛教术语,指将佛经中的故事、人物、教理用绘画的方式形象地展现出来,“变相”就是佛教故事的画卷。“变文”是“变相”的文本,而“变相”是“变文”的图画。这样的借助图像来讲述故事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依赖。画卷所具有的直观性成为一种跨越文化的交流工具,让来自各个民族的人通过看到这些图画而想象这个故事,这对于沟通敦煌的多元文化受众至关重要^[7]。

变文起源于佛教俗讲,用来演绎佛经故事。与内地变文多讲佛经故事或历史传说不同,《张议潮变文》取材于当代史和本地英雄。它讲述的是听众及其父辈亲身经历或耳闻的重大事件,主角张议潮是他们身边的领袖。这种“本土化”和“即时性”,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众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敦煌的说唱艺人或者和尚们,把原本是用来宣传佛教的演绎,巧妙地用来歌颂当时的地方领袖。在以佛教为主的敦煌地区,使用变文体来讲故事,就是最能触动人们心灵的方式。当熟悉的唱诵声响起,即使内容由“佛陀降魔”变成“仆射破虏”,其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是相同的。

变文中抗击吐蕃、尸横遍野等尚武雄健的描写,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对河西走廊严酷生存条件的真实折射,在强敌环伺的河西地区,勇武是生存的第一要素,这符合敦煌军民心理特点,也最容易引起共鸣。变文在丝路上的讲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工具。通过将张议潮描述为“大唐忠臣”与“敦煌守护神”,使变文的讲唱在潜移默化中向民众传递了归义军政权的合法性。它强调“归义”的正当性,这对于团结河西地区心向大唐的汉人至关重要。

2.2 胡风汉骨的语言审美特质

河陇地区在被吐蕃占领以前,陇上以及黄河以西主要以汉语为主;氐、羌系民族以及吐蕃人所使用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其他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中的诸多语言。在吐蕃统治河陇地区之前,以汉族为主体的河陇各族虽有各自的语言,但通用的语言

以汉语为主。由于是在多民族环境中产生的作品,《张议潮变文》的语言必然受到“胡风”的浸染。

文本中最为明显的语言交融就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名词。比如地名、族名以及官称等。文本中大量使用的“吐浑”或者“退浑”,就是“吐谷浑”。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名称汉语译名。“吐谷浑”是来自东北部迁入青海地区的鲜卑人所建立的一个国家,后来被吐蕃所灭亡,在张议潮起义时期,“吐谷浑”是指已经被吐蕃统治了一百多年的原先属于吐谷浑的各部落人民。他们在吐蕃统治下,常作为吐蕃军队前锋与归义军交战。这些词汇是文本中未被汉化的少数民族语言符号。它们的每一次出现,都在提醒读者故事发生的多民族舞台背景。“吐浑”一词本身就标志着与汉族相对的“他者”存在,是民族在语言上的直接体现。

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当时的敦煌汉语,其句式结构已经受到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出现一些不同于中原常规语法的表达习惯。阿尔泰语系(如回鹘语)通常是主语+宾语+动词(SOV)语序^[8]。根据现存文献,回鹘语和粟特语其中心词出现在修饰成分之后,谓语出现在主语之后。的语序结构基本上都是SOV。而标准汉语是主语+动词+宾语(SVO)的语序,如“汉军||击败||贼兵”。在《张议潮变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SOV语序。

例如“便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①此句便是处所状语+动词这种结构将地点状语提前,紧靠动词,是SOV语言中“宾语前置”习惯的延伸。翻译过来就是军队选取西南方向的快捷道路进军。这里“西南上把疾路”这个长长的方位名词,放在了动词“进军”之前。虽然现代汉语也能这么说,但在文言中,更常见的表达是“即取西南疾路而进军”,用“而”连接状语和动词。变文中的句式省略了连接词,让方位名词与动词直接链接,结构更紧凑,带有一种“目标”+“动作”的直接感。

另外还有“行经一千里已来,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迭。”^②意为“追逐一千多里,直到退浑国内,才追上。”这是一个连动句,其核心是“直到退浑国内”+“方始趁迭”。这形成了“地点状语+动词”的紧密结构。在汉语文言文中,更常见的表达则是“直趁退浑

国内,方始及之”,将动词“趁”前置。而变文将抵达的终极地点“退浑国内”完全置于动词“趁迭”之前,突出目的所在。这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语法结构,在变文中也屡见不鲜。

本文中的一些名词用法、语法结构等都受到当地各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地方色彩的敦煌语体。

2.3 尚武雄健的审美风格

与中原地区许多变文侧重于佛教的慈悲情怀或是才子佳人、红袖添香的婉约缠绵气质不同的是,《张议潮变文》通篇弥漫着一种扑面而来的尚武雄健之气,这种审美风格是它所具有的文化交融性的最突出特点。

变文用富有动感和力量的语言描写归义军如摧枯拉朽一样的战争场面,塑造出雷霆万钧,势不可挡的战斗美。比如,“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点兵,凿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才经信宿,即至西同侧近。便拟交锋”^③、“把疾路”“才经信宿”这些词语都表现了归义军进军速度之快,体现了张议潮一闻敌情就雷厉风行,果断出击的军事作风,也说明归义军战斗力强大、作战勇猛的特点。“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煞戮横尸遍野处。”^④这是对归义军大胜的经典描绘,充满了动态和力量感,展现了汉军高昂的士气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凸显归义军气势如虹,行动迅速而猛烈;“蕃贼獐狂,星分南北”则将敌军溃退,四散而逃的落魄刻画得淋漓尽致;“不过五十里之间”再调胜利的迅速与彻底。“煞戮横尸遍野”则具有极强的画面感,直白地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展现出来,这种描写,并非为了渲染恐怖,而是反衬归义军的武勇和战争的激烈,是尚武审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观众烘托了紧张刺激的视听氛围。文本对阳刚之气极致推崇,并用大量笔墨铺陈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如“两军相见如龙斗,纳职城西赤血流。”“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⑤这种对力量、速度和战斗技艺的崇拜,与唐代前期边塞诗的精神一脉相承,但更添几分身处生存边缘的紧迫感与实战性。

北方游牧文化的审美观念也影响到变文的文体特点,归义军要在四周强敌夹击之下存活,正如文中所说:

^①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页。

^②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页。

^③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页。

^④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页。

^⑤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5页。

“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①必须厉兵秣马，同时吸收对手的军事优势和勇武精神，随时准备迎战。变文中表现出的刚健之美，是唐朝中原地区尚武之气的遗存，也是对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文化审美因素的学习和借鉴。这种审美是一种朴素、坦率、有力的美，它不是文人凭空想象，而是边疆军民亲身经历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受，在与恶劣自然环境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产生，更反映了敦煌社会在长期战争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审美取向，多民族文化交融体现在当地创作者对文体的选择、对语言的使用上，甚至整个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风格上。变文以说唱的形式进行表演有利于它跨越民族之间的传播障碍；语言上的“胡风”气息反映着多种语言交流的历史背景；而那种迥异于中原温柔敦厚诗学传统的尚武雄健风格，则是河西地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后的审美集中体现。这一切共同证明，《张议潮变文》从文体特色到精神内涵，都是丝路文学的典范。

3 结语

《张议潮变文》生动诠释了战争冲突与政治认同的辩证统一，更暗藏“胡风汉骨”的文化交融底蕴，是研究敦煌丝路文学与民族交融的重要文学范本。文本中虽充斥着与吐浑、回鹘等部族的激烈战事，直观呈现了民族矛盾，但这种武力冲突并非强化民族隔绝与仇恨，反而构建起以“归义”“大唐”为核心的叙事框架。张议潮及归义军的军事行动，被塑造为“初霁圣泽愁肠散，不对天颜誓不归”^②的正义之举，彰显了对唐王朝的忠诚。而这样把地方性的争斗与中央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很好地反映了河西地区对于中原的文化归属感。

语言以及审美的融合性更加突出，在语言方面，变文是以汉语为基础，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通俗化的敦煌地方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尔泰语系 SOV 结构及汉藏语系的影响，在词汇中也大量出现诸如“猓狻”“匈奴”之类的部族名称，是汉胡长期交流的结果；在审美方面，它尚武雄健的特点也十分突出，一方面它汲取了汉唐边塞诗文中的豪迈气魄，又融入游牧民族刚健质朴，形成了归义军时期的独特英雄主义社会风貌。

变文作为归义军政权凝聚力量的通俗文化载体，

将张议潮塑造成符合汉族忠勇传统要求，贴合边地人民尚武风气的英雄形象，从而团结起沙洲乃至其周边各族民众。作为丝路文学的结晶，敦煌文学历来是学界热点，变文中的历史人物与民族文化研究仍有广阔空间。它既是连接大唐汉文化传统与吐蕃、回鹘等多元民族文化的桥梁，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从无数具体而微小的西域叙事中，谱写出家国大义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史诗。

丝路文学是流淌于铁血风沙间的文化长河，从昭君出塞到张议潮归义，其书写既是历史人物的英雄史诗，更是文明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深刻对话。敦煌文学超越了简单的“华夷之辨”，集战争史诗、异域风情于一体，记录着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碰撞融合，铸就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成为家国、历史与人类命运的永恒雕刻。

参考文献

-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2.
- [2]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16.
- [3] 李玉君.华夷之辨·华夷之辩·华夷之变——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再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139-149.
- [4] 刘进宝.归义军及其政权始末述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47-51.
- [5] 莫道才,钱辉.敦煌变文讲唱形式与骈体[J].文学与文化,2025,(1):108-114.
- [6] 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评述[J].艺术百家,2010,26(5):196-200.
- [7] 刘正平.神变、变相与变文——再论变文名称问题[J].世界宗教文化,2015(2):116-120.
- [8] 木再帕尔.《粟特语对回鹘语语法的影响》[J].民族语文,2020(2):54.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①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第114页。

^② 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9页。